

論蔣介石對戰時德國之立場與其雙重性*

常子磊¹、楊漢馳

(1.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候選人)

摘要：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國與納粹德國關係曾相當密切。1941 年中國對德國宣戰後，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對德國採取複雜且矛盾之政策立場。一方面，他將德國軍事行動與中國抗日戰爭相互聯繫，試圖借助同盟國合作抗擊軸心國；另一方面，他對德國軍事技術保持關注，並計劃利用德國科技人才進行戰後建設。然而，蔣介石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往往過於理想化，例如其堅持認為日本必然進攻蘇聯的預測，以及對德國戰敗後人才利用計劃的期待，均與實際發展存在較大偏差。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對待戰敗德國問題上採取將德國民眾與納粹政權區分對待的傾向性政策。這種政策取向雖體現出一定的現實考量，但也反映出其對德國軍事現代化的借鑒過於著重技術層面，而對其制度根源缺乏深入認識。本研究通過考察蔣介石 1941 年後的對德政策，為深入理解這一時期中、德關係之複雜性提供新視角。

關鍵詞：蔣介石、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關係

*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01 日；通過日期：2025 年 08 月 08 日。

Chiang Kai-shek's Position on Wartime Germany and its Duality

Chang, Zilei¹; Yang, Hanchi

(1.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efore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na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azi Germany. After China declared war on Germany in 1941, Chiang Kai-shek, as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China War Zone, adopted a policy toward Germany that was both complex and inherently contradictory. On the one hand, he linked Germany's military actions to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ttempting to leverage Allied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Axis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he remained attentive to Germa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formulated plans to harness Ger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for post-war reconstruction. However, Chiang's assess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ere often overly idealistic. For example, his persistent belief that Japan would inevitably attack the Soviet Union and his expectations of utilizing German talents after Germany's defeat were significantly misaligned with actual developments. Notably, Chiang adopted a policy that drew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erman populace and the Nazi regime whe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defeated Germany. While this policy reflected a certain degree of pragmatic consideration, it also revealed his emphasis on Germany'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with insufficient reflection on the systemic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German militarism. Examining Chiang Kai-shek's policies toward Germany after 1941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Germany; World War II; Sino-German Relations

一、引言

國民黨統治下中國與納粹德國關係一直是個重要研究課題。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中、德兩國關係逐漸密切，在經濟、軍事等領域有過合作，南京國民政府也借鑒納粹政權部分統治方式，這一選擇值得商榷。1941 年中、德斷交後，兩國間官方聯繫基本中斷。1941 年 12 月 9 日，國民政府對德宣戰，中、德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分別在對立同盟國陣營和軸心國陣營中扮演不同角色。由於地理阻隔，兩國在戰爭期間幾乎沒有直接軍事衝突，但蔣介石仍持續關注德國。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對德國觀察存在明顯矛盾：一方面試圖從戰略層面分析德國軍事動向，但這些分析往往過於主觀；另一方面對德國軍事力量與作風評價又過分理想化，反映出其認識上侷限性。同時，蔣介石對德國民眾和納粹政權採取區分對待態度，這種政策取向形成原因及其實際效果也需要進一步探討。

目前學界對於 1941 年中國對德宣戰前中、德關係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對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後蔣介石對德國動向的觀察、研究和接觸也有涉及，但仍有深入研究空間。¹ 本文將依據相關史料，對蔣介石在中、德處於戰爭狀態時期的德國觀進行

¹ 涉及中德戰前關係的主要論著有：張憲文，〈三十年代中德關係初探〉，《歷史檔案》，第 2 期（北京：1990）；吳首天，〈論希特勒的對華政策（1931-1941）〉，《民國檔案》，第 2 期（南京：1990）；吳景平，〈抗戰初期的中德關係〉，《民國春秋》，第 2 期（南京：1995）；易豪精，〈從「蜜月」到斷交——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中德外交關係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第 6 期（北京：1995）；張北根，〈1933-1941 年的中德關係〉，《歷史研究》，第 2 期（北京：1995）；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第 4 期（開封：1996）；陳方孟，〈論抗日戰爭初期德國的對華政策〉，《抗日戰爭研究》，第 2 期（北京：1996）；何蘭，〈試論 1938-1941 年的中德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6 期（武漢：1997）；王建朗，〈抗戰時期中外關係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第 3 期（北京：1999）；徐暉，〈抗戰爆發前後中德關係的演變〉，《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徐州：2000）；張北根，〈抗日戰爭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北京：2006）；左雙文，〈轉向聯德，還是繼續親英美？——滇緬路事件後國民黨內曾謀劃調整外交路線〉，《近代史研究》，第 2 期（北京：2008）；李樂曾，〈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對德政策——以朱家驊使德計畫為中心〉，《德國研究》，第 4 期（上海：2009）；張北根，〈國民黨與德國的關係：1912-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第 5 期（北京：2008）；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反應〉，《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北京：2011）；鹿錫俊，〈蔣介石對日德意三國同盟的反應〉，《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北京：2013）；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戰爭的預測及因應——蔣介石抗日外交個案研究之四〉，《抗日戰爭研究》，第 1 期（北京：2014）；秦世強，〈抗戰時期蔣介石謀求蘇聯對日作戰的心路歷程——以〈蔣介石日記〉

分析。

二、關注德國和歐洲戰局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蔣介石在 8 日凌晨 4 時得知這一消息後，在當天國民黨中央常會特別會議中決定對德、意、日三國宣戰。² 對於為何在對日宣戰同時對德意兩國宣戰，蔣介石想法是「放棄其無關緊要與侵略暴行之德意，而獲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同時對蘇、英、美三國「皆有發言之地位」。此外，蔣介石也認為世界大戰「必為一整個之總解決，斷不容分別各個之媾和，否則雖成亦敗矣」。³ 可見蔣介石已將盟國對德、對日戰爭相聯系。為避免同盟國陣營出現「分別各個之媾和」情況，蔣介石在 8 日下午約見美、英、蘇三國大使時分別遞交建議書中特意寫上「中國提議中、英、美、蘇、澳、荷、加拿大、紐西蘭訂立一不單獨媾和之條約」一條。⁴ 12 月 9 日，國民政府在對日宣戰，也對德國與義大利宣戰，廢止中國與德國一切條約、合同。至此，自二十世紀 30 年代以來一度迅速發展中、德關係完全惡化，兩國處於戰爭狀態。在對德宣戰後，蔣介石仍然站在戰略高度密切關注德國侵略動向並進行研究，尤其是可能與中國抗日戰爭有直接關係動向。通過對德國關注研究，蔣介石產生兩點認識，第一是蘇德戰爭將使日本進攻蘇聯，影響中國抗戰局勢，第二是德國銳利攻勢讓蔣對盟國「先歐後亞」戰略產生不滿。

（一）、蘇、德戰爭中對日戰略考量

日本與蘇聯矛盾相當尖銳，兩國曾發生多次武裝衝突。一旦日本與蘇聯交戰，將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產生巨大影響。在應對日本侵略時，蔣介石便設法使蘇聯對日

為中心》，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長春：2007）；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等。

²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臺北：「國史館」，2010），605-606。下同。

³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 年 12 月 9 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⁴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619。

作戰，以減輕中國抗日壓力，這一點已有學者進行過研究。⁵ 事實上，蔣介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認為蘇德戰爭將刺激日本主動進攻蘇聯。早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蘇德戰爭爆發時，蔣介石便重視對蘇德戰局觀察，並認為日本即將進攻蘇聯。在 22 日當天日記中，蔣介石寫下「倭於下月將攻俄乎」。⁶ 在次日午餐時，蔣也對翁文灝、居正等政府要員宣稱日本必將進攻蘇聯，汪精衛赴日即是為將淪陷區交給汪自行管理，以便日軍抽調征蘇。為此，蘇聯應先發制人進攻日本。⁷ 此後數月，蔣介石密切關注蘇德戰況與日本動向，堅持認為日本將進攻蘇聯，⁸ 並開始研究日蘇開戰後中國應對之道。⁹ 在蔣介石看來，與德國夾擊蘇聯對日本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¹⁰ 而一旦日本因德國侵蘇而與蘇聯交戰，必將大大減輕中國對日作戰壓力，使抗戰前途轉危為安。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德、俄開戰，不惟我民族生命得有保障，即世界人類亦得一新生命矣。」¹¹ 蔣甚至認為蘇德戰爭「未始非希脫勒助我之力也。」¹²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仍然認為日本將進攻蘇聯。在 1942 年 1 月 17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俄決不主動攻倭，必待倭來先攻，而後應戰之心理，無可改變，只視四五月之間是否倭敢攻俄而已，以理推之，勢所必然也。」¹³ 1 月 19 日，軸心國規定三國軍事新協定，蔣介石認為「其目的必於西比利亞或在印度洋打通一面，以謀歐亞雙方之能確實聯繫也」。¹⁴ 1942 年上半年，德軍在莫斯科戰役後恢復元氣，開始重振旗鼓，蔣介石愈加確信日本將趁機攻蘇。在蔣介石日記中時常可見他對日蘇開戰預測，如「今春德倭挾攻俄國，反為我所窺明」，¹⁵「倭此時北進攻俄，

⁵ 參見秦世強，《抗戰時期蔣介石謀求蘇聯對日作戰的心路歷程——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⁶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 年 6 月 22 日。

⁷ 翁文灝，《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668。

⁸ 如在 6 月 27 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對俄、倭關係及其必戰之理論，幾近我六小時之思索獲得結論，此心乃安。」《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 年 6 月 27 日。

⁹ 如在當年 6 月 25 日的日記中，蔣寫下「俄、倭開戰後，我國之態度與軍事、政治之準備」。《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 年 6 月 25 日。

¹⁰ 蔣介石，〈我國抗戰與國際形勢的展望〉，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八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412。下同。

¹¹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本月反省錄，1941 年 6 月 30 日。

¹²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 年 7 月 1 日。

¹³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 月 17 日。

¹⁴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 月 19 日。

¹⁵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 月 28 日。

則南洋各島約留十個師兵力已足，其餘十餘師皆可抽調為攻俄預備隊之用」，¹⁶「倭寇此後攻俄必不在遠，或不待德國春季攻勢，而彼先自發動實有可能」。¹⁷ 5 月 16 日，蔣在日記中專門寫下「德俄與俄倭關係之研討」一項。¹⁸ 可見他已把蘇德戰爭與日蘇關係置於同一高度進行思考。

蔣介石對於德日聯合進攻蘇聯可能性深信不疑，一個重要原因在於 1942 年德軍在蘇聯南部發動大規模攻勢，一度勢如破竹，讓他認為這是德日夾擊蘇聯「良機」。如德軍在重鎮哈爾科夫重創蘇軍後，蔣介石記道：「卡科夫（今通常譯為哈爾科夫——引者注）俄軍失敗，據德國所報，俘俄軍十八萬人，果確，則倭攻俄之期更近矣。」¹⁹ 在此後數月，德軍兵臨蘇聯重鎮斯大林格勒，蔣介石也數次在日記中記下自己對日本侵蘇預測。²⁰ 他甚至懷疑，德軍發動對斯大林格勒攻勢最重要原因是否就是強迫日本夾擊蘇聯。²¹ 當年 11 月，德軍深陷斯大林格勒城不能自拔，這種情況讓蔣介石一度對日本侵蘇可能性進行重新判斷：「最近英美之勝利與德意之敗挫，實有使倭國對俄不敢啟釁之可能，如此，其陸軍集中東北，養蓄不用，對於我之危機加大矣。」²² 但很快，他的日記中又有「倭之攻俄亦將不遠」記載。²³

1943 年新年之際，蔣介石在日記中「本年預想之險象危狀應注意各點」寫下「德倭挾攻俄國」一條，仍然相信日本侵蘇可能性。²⁴ 但就在 1943 年初，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遭到毀滅性打擊，蘇德戰爭勝利已經開始向蘇聯傾斜。在這樣情況下，蔣介石卻仍然堅信日蘇交戰可能性，只是他認為此時戰事吃緊德國脅迫日本進攻可能性更大。如當年 1 月 15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德國催倭進占西比利亞之急迫。」²⁵ 即便在有跡象證明日本已經對蘇聯妥協情況下，他仍然堅持己見。如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議會演講中「盡力宣傳對俄關係」，日俄進行漁約與運金交涉，他雖

¹⁶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3 月 14 日。

¹⁷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4 月 18 日。

¹⁸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上星期反省錄，1942 年 5 月 16 日。

¹⁹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5 月 29 日。

²⁰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6 月 13 日，1942 年 6 月 20 日，1942 年 9 月 24 日，1942 年 9 月 27 日等。

²¹ 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道：「德國對俄攻勢中心之原因或強倭寇之同時夾攻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6 月 7 日。

²²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1 月 7 日。

²³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2 月 5 日。

²⁴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本年預想之險象危狀應注意各點，1943 年 1 月 1 日。

²⁵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 年 1 月 15 日。

在日記中均有記錄，卻都在後面寫上日本侵蘇的能性。²⁶ 甚至日本內閣在 1943 年 4 月 20 日進行改組（當天為希特勒生日），蔣介石皆認為是日本對德國順從和準備攻蘇表現。²⁷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堅持己見，一方面是因為斯大林格勒戰役德軍雖敗，卻仍然在蘇德戰場佔據局部優勢，²⁸ 另一方面是他認為這是日本轉敗為勝唯一機會。²⁹ 此時日德兩國軍事形勢已經急轉直下，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形勢嚴峻，不可能再為同樣走向失敗德國與蘇聯對抗，蔣介石判斷顯得武斷，但也反映出他對日本攻蘇所抱希望之大。到 1944 年，日德兩國都已窮途末路，這時蔣介石自然不再考慮日本攻蘇可能性。³⁰

（二）、對盟國「先歐後亞」戰略不滿

二戰戰場主要分佈在歐、亞、非三大洲，德國是盟軍在歐洲戰場主要打擊對象，非洲戰場作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歐洲戰場服務。為儘快打敗軸心國陣營中最為強大德國，同盟國在戰爭中奉行「先歐後亞」戰略，將人力資源優先用於對德戰爭，這對於已經獨立抗日多年中國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因此蔣介石曾多次反對同盟國先歐後亞戰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轉移英美先德後倭之心理，應告其東亞戰局果延長，則其殖民地民族必動搖，且必為倭軍利用，則大局不堪問矣。」³¹ 又寫道：「英美先解決德國，而後對倭之方略錯誤，應使之徹底改正。」他也多次向盟國提出改變盟國戰略要求，如在 1942 年 6 月，蔣介石曾致電遠在美國的宋子文，要求在太平洋作戰會議開會時提出改變先解決德國，後解決日本戰略。³² 但同盟國既定戰略不會因為蔣介石要求而改變。1943 年英國首相邱吉爾致電蔣介石，稱英國在擊

²⁶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 年 1 月 28 日，3 月 7 日。

²⁷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 年 4 月 23 日。

²⁸ 如 1943 年 3 月 31 日，蔣介石記道：「俄德戰爭，德國仍處優勢地位，俄倭開戰之期，尚難預料，但其因素並未消弭耳。」

²⁹ 蔣介石在 4 月 4 日的上星期反省錄寫道：「為倭計，此時惟有與德挾攻俄國繳幸獲勝是為其惟一生路。」

³⁰ 參見秦世強，《抗戰時期蔣介石謀求蘇聯對日作戰的心路歷程——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³¹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 月 14 日。

³²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9），598。

敗德國後，將儘快支援遠東對日作戰。³³ 但遠水難解近渴，盟國將德國作為主要打擊對象，難免使日本得到喘息機會，從而加大中國抗戰壓力。1942 年第 9 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吳逸智曾致電蔣介石，認為盟國將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之危害，吳認為盟國一時難以形成對德國之絕對優勢，一旦形成相持之局將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吳逸智認為盟國當務之急是集中力量擊敗日本。³⁴

事實上蔣介石想法與吳逸智類似，認為盟國對德戰爭一時難以取得勝利，等待盟軍戰勝德國再進攻日本可謂遙遙無期。在對德宣戰後，蔣介石關注英美盟軍對德作戰，對於美英軍隊對德作戰戰況多次作出評價。在一段時間內，他對於對德作戰持悲觀態度，對於盟國軍隊表現評價不高，認為英美「自私自利」「零亂大意」，「戰鬥組織與精神萬不能及德倭也」。³⁵ 在此後一年中，這種評價時有出現。如在 1942 年 2 月，數艘德國主力艦在英吉利海峽衝破英國皇家海軍封鎖，³⁶ 雖然這樣行動無法改變英德海軍實力對比，但蔣介石因此斷定「英之海空軍技術遠不如德矣」。³⁷ 這一年英軍在北非屢遭失敗，蔣介石也給予關注，甚至對英國失敗也有譏評。³⁸ 盟軍暫時失利也讓蔣介石開始考慮德國勝利可能性，認為英國將被擊潰，蘇軍將退守烏拉爾山脈以東，但日本也將被中、美、蘇擊敗，最終中、美、德三國可能成為「和平之重心」。³⁹ 蔣介石的預測不僅完全偏離戰爭實際走向，也暴露出其在國際戰局研判上缺陷。

蔣介石高估德國實力，對歐戰前景悲觀，除了被當時德國暫時勝利蒙蔽以外，他對盟國「先歐後亞」戰略不滿也是重要原因。蔣介石認為「若我同盟國再不從整個戰局與根本計劃，作一具體有程式之打算，而仍如過去局部枝節之動作，忽近圖遠，舍易就難，與捨本逐末，處處立於被動地位，則戰局前途，殊難樂觀，甚至形成整個失敗之慘劇，亦未可知也。」⁴⁰ 將這種想法置於當時具體環境下是有合理性。

³³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2），381。

³⁴ 《對美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04-036。

³⁵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 月 19 日。

³⁶ 即二戰史中著名的「雷霆-瑟布魯斯行動」。

³⁷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2 月 17 日。

³⁸ 1942 年 6 月 27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以英國之自私卑劣之行動，毫無道德觀念而言，英國非大敗不可，蓋其德性與道義比之德倭尤為低劣也。」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6 月 27 日。

³⁹ 《蔣介石日記》，本月反省錄，1942 年 8 月 31 日。

⁴⁰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7 月 31 日。

一方面，在二戰前期，德國國力強盛，科技先進，在侵略戰爭中不可一世。在這種情況下，同盟國在短期內打敗德國可能性不大。而日本雖然在戰爭初期也曾屢屢得手，但綜合國力明顯弱於美、英兩國，因此對日作戰難度是要小於對德作戰。正如蔣介石所說：「軸心國家中第一個先失敗一定是日本，因為德國兵力運用，完全在大陸，有鐵路公路可供運輸，不必使用海軍。所以如果英、美兩國不能在歐洲大陸發動有效反攻，則德國還不至於輕易失敗。」⁴¹ 另一方面，中國在同盟國陣營中長期遭遇不平等待遇。盟國長期將戰略重心放在歐洲，雖然取得對德作戰勝利，但是以犧牲中國等弱國利益為代價。如就美國租借法案援助物資數量而言，中國在二戰中共獲得價值 8.457 億美元物資，僅占美國租借援助總數 1.8%，而英、蘇兩國所得占援助總數 86.47%，已經失去本土法國尚占援助總數 5.85%。⁴² 就軍火援助一項而言，美國援助對於中國來說雖是雪中送炭，但數量遠不足以使國民黨軍隊裝備情況得到根本改觀，再考慮運輸和史迪威與蔣介石圍繞軍火問題產生衝突等問題，最後中國實際獲得美國軍援「數量極為有限」。⁴³ 因此，中國戰場情況與歐洲和太平洋戰場截然不同。在 1944 年，同盟國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取得重大勝利，中國軍隊卻在豫湘桂戰役中失利，蔣介石聲稱原因是英美蘇「本其歐洲為主的方針」，使中國軍隊「仍要以劣勢裝備應付敵人各種可能的攻擊」，中國軍隊失利「絕非偶然的，乃是勢所必然的」。⁴⁴ 雖然蔣介石有推責之嫌，盟國輕視中國戰場亦是事實，但豫湘桂之敗，歸根究柢仍是他在統帥與決策上嚴重錯誤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盟軍在歐洲戰場勝利，蔣介石在戰爭後期已不再急切要求盟國改變「先歐後亞」戰略，甚至表露出希望德國能夠多支撐一段時間。在 1944 年 2 月，蔣介石竟在日記中寫下：「歐洲戰場在此一年內決不能結束，甚至再延長至二年以上亦未可知，如此則對倭之東亞戰爭仍可先於歐洲結束。此則餘惟一之期望也。」⁴⁵ 顯然，蔣介石此時更加擔心蘇聯在歐洲戰爭結束後對中國戰場介入。這種對德國戰事之期待反映出蔣介石在政治判斷上短視，沒有充分認識到蘇聯作為盟

⁴¹ 蔣介石，〈國軍入緬作戰經過和決心與我全軍對世界戰局演變應有之認識和準備〉，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九卷，90。

⁴² 李琳，《租借法案在華實施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⁴³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78），333。

⁴⁴ 蔣介石，〈一年來軍事、外交、政治、經濟之報告〉，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卷，503。

⁴⁵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年 2 月 25 日。

友之重要性，反而可能影響中、蘇關係。在當月底擬定的 3 月大事預定表中，蔣介石也寫道：「如德軍果取守勢，則其死傷數率必可減少，持久之力必可增強，如此歐戰結局當比亞戰為遲矣。」⁴⁶ 但在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投降時，蔣介石又記道：「我國不能不作歐戰勝利之慶祝也，弱國無力，不能不在人後也。」蔣介石在日記中感慨，反映出中國在同盟國陣營中之從屬地位。這種局面固然與國際力量對比有關，但也暴露出國民政府在戰時未能有效整合軍事力量、提升作戰能力的失敗。豫湘桂戰役慘敗就是明證，不能簡單歸因於盟國的「先歐後亞」戰略。

蔣介石在二戰中對德國動向判斷，暴露出國民政府在情報搜集和戰略研判能力上侷限，其主觀願望往往大於客觀分析。

三、對德國軍事體系之仰慕與引進人才

中、德兩國在近代交流很多，德國在許多領域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蔣介石歷來對德國興趣濃厚，二戰時期蔣介石對於德國軍事力量與作風之關注與欣賞，是他追求中國軍事現代化表現。在戰爭末期，蔣介石還利用德國人才進行戰後建設計劃。

（一）、對德國軍事力量欣賞

蔣介石在青年時代便嚮往德國，一度開始學習德語，準備赴德學習。他曾聲稱，對他的軍事思想產生影響最大兩部書是德國人寫之《巴爾克戰術》和《戰爭論》，其中《巴爾克戰術》一書蔣介石年輕時看過六遍以上，直到 1924 年仍重新研讀——當時他已身為黃埔軍校校長。⁴⁷ 可見蔣介石對德國軍事推崇。這種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 30 年代納粹德國與中國外交，在中、德關係蜜月期，德國對中國軍事、工業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德國軍隊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軍隊仿效對象。1939 年，留學德國歸來陸軍大學學員楊彬向軍政部遞交報告書，內容詳細介紹德國軍隊概況，並

⁴⁶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本月大事預定表，1944 年 2 月 29 日。

⁴⁷ 蔣介石，〈對克勞塞維茨著作的感想〉，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五卷，22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1887-1926》（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50。

對德國陸軍各方面都進行細緻考察，指出德國軍隊具有「精神團結，意旨統一」，「對於參謀官與副官均極重視」等優點，以及各項設施完備，對德軍極為推崇。他認為「鑒於此次中日戰爭以來，我國對於士兵之教育訓練，急宜注意，嚴格訓練。」⁴⁸當時歐戰尚未爆發，部分中國軍人就已經認識到德國軍事力量強大。急於應對日本侵略，提升中國軍隊戰鬥力之蔣介石自然對德國軍力感興趣。在歐戰爆發時，蔣介石關注歐洲戰事，對於歐洲現代化戰爭也產生興趣。為更好搜集歐洲戰場各方面情報，蔣介石在 1940 年密令組織「歐戰研究會」，該會經費由軍令部第二廳供給。⁴⁹在當時該會經費充裕，在 1941 年 1 月至 6 月便拿到 12000 元，7 至 9 月拿到經費 10800 元，扣除基本花銷後尚有餘錢。⁵⁰這是蔣介石關注歐洲戰局之一個重要憑證。

1941 年中國對德宣戰後，兩國自然不可能再有交流與合作，但蔣介石對德國關注並沒有停止。在蔣介石戰時日記和講話中，時常可見他對德國之欣賞。在 1942 年 2 月，蔣介石得知德軍在北非戰場擊敗英軍後，在日記中寫下「可謂雄矣」評語。⁵¹到 1943 年 5 月，德軍名將隆美爾在劣勢之況下，成功率軍從北非阿拉曼安全撤至突尼斯，暫時保全德軍僅存之量。對於這一點，他更是高度評價，並在日記中寫道：「德國之北非統將隆美爾，其自『艾爾阿拉敏』（即阿拉曼—引者注）直退『突尼斯』，如此長距離，且在沙漠地之退軍，不過兩月時間，得以從容安全脫退，此非大軍事家最卓越之將才，決不能至此。今日突尼斯雖終失陷，但隆美爾退兵之奇跡，在戰史上實雖敗猶榮也，神馳無已。」⁵²蔣能對隆美爾這樣一位前線指揮官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反映出蔣介石對德軍將領特殊關注。然而，這種評價也反映出他對德國軍事體系認識侷限。蔣介石過分關注德軍將領個人戰術才能，而對納粹軍事體系整體特徵及其與極權政治之間關係缺乏深入思考。這種侷限性影響他後來對軍隊現代化改革之成效。

在對部下講話中，蔣介石也多次表露對德國高度評價。1940 年，他在一次總理紀念周的講話中談到日軍仿效德國閃電戰來襲擊中國軍隊時，曾說道：「他自以德國

⁴⁸ 《留德陸軍大學學員楊彬關於德國軍隊設施概況的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軍政部檔案，檔號 773-938。

⁴⁹ 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11），1159。

⁵⁰ 《軍令部有關歐戰研究會經費報銷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檔號 787-2578。

⁵¹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2 月 1 日。

⁵²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本月反省錄，1943 年 5 月 31 日。

自比，更是『東施效顰』之所為，以敵國工業與武器裝備而欲比美於德國，並且要仿效德國閃電戰術猛進深入行動，以求結束侵略中國戰爭，實無異於以一病夫而以烏獲自負，安得不困憊竭蹶而斃呢？」⁵³ 在這裏，蔣介石將德軍比作中國古代大力士烏獲，雖然並未帶有明顯褒義色彩，也帶有為部下打氣成分，但足見他對德軍評價高於日軍。

即便對德宣戰後，蔣也不對部下諱言德國優秀軍事作風。如在 1942 年第 24 期黨政訓練班畢業訓詞中，蔣評價德國人「號令一致，步驟齊一，能夠為團體而犧牲小我」，「德國之國民性先天具有協同團結精神」，當然，考慮到中、德此時已處於敵對狀態，蔣介石也指出「現在納粹殘暴侵略，當然我們要反對」。⁵⁴ 在高度評價德國軍事力量和作風之際，蔣介石也要求部下向德國學習。他在對陸大學員講話中要求通過提高軍人素質使中國軍隊能夠與世界上任何強大陸軍國家並駕齊驅，「至少能和德國陸軍一樣」。⁵⁵ 蔣介石提出這樣嚴苛要求，也要求部下從細節著手，學習德國軍隊化軍事作風，如「三個人聚集一處，就能組織一個軍隊」紀律性，吃飯「都是說要吃夠，沒有聽說要吃飽」節約風氣。不僅蔣介石試圖學習德國軍隊，一些中國軍事將領也有意向德軍學習。連美國將領史迪威也向蔣介石總結德國軍隊在蘇聯取勝之經驗。⁵⁶ 另外，對於德國武器，蔣介石亦感興趣。在蔣介石日記中，曾有盟國以繳獲德國 150 毫米火炮接濟中國記載。⁵⁷ 1945 年 8 月 3 日，何應欽甚至向蔣介石報告說兩個月後將有兩船德國軍火運抵中國，是以阿富汗名義向德國訂購。⁵⁸

在抵抗外敵戰爭中，以及與國內政治對手鬥爭中，蔣介石往往會觀察和借鑒對手某些做法。然而，這種借鑒往往是片面和選擇性：例如他對德國軍事技術和軍隊紀律關注，主要著眼於技術層面和表象特徵，而對其深層政治制度和社會根源缺乏

⁵³ 蔣介石，〈最近國際大勢與中日戰局〉，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七卷，364。

⁵⁴ 蔣介石，〈黨政訓練班第二十四期畢業訓詞〉，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卷，173。

⁵⁵ 蔣介石，〈陸大學員之責任與基本的修養〉，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七卷，5。

⁵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1942 年 7 月 12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438-439。

⁵⁷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5 年 3 月 12 日。

⁵⁸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四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302-001。

深入理解。這種觀察和借鑒侷限性，也影響他後來在臺灣軍事改革成效。在 1944 年的松山戰役中，蔣介石曾在給前線將領一份電報中要求中國軍隊「須以日軍松山守備隊、密支那守備隊孤軍奮戰至最後一人拼死完成任務之情狀為典範。」⁵⁹ 蔣介石也總結過中共優點，雖然沒能挽救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統治，但對蔣鞏固在臺灣統治大有裨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蔣介石對德國軍事技術和作風關注，體現出他對德國軍事現代化選擇性借鑒，但這種借鑒往往停留在表面層次，缺乏對其制度根源深入理解。這樣學習延續到蔣介石退居臺灣時期，蔣緯國在蔣介石支持下主持「培德計劃」，組建「明德小組」，選派中國留學生到德國學習軍事，聘請德國軍官來臺指導。⁶⁰

（二）、計劃利用德國技術人才進行建設

蔣介石不僅著力學習德國軍事，也曾考慮在戰後聘請德國工程師支持中國建設。國民黨人利用德國技術人才來建設國家想法由來已久。早在 1922 年，孫中山就指出：「惜乎國人不明俄、德真相，徒以德國大戰失敗，為不足齒列，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皆足資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⁶¹ 1923 年，孫中山提出中、德合作構想：「中國以物資人力，德國以機器科學，共同合作發展中國之富源，改良中國之行政，整頓中國之武備。總而言之，即借德國人才學問，以最速時間，致中國於富強。此步達到，則以中國全國之力，助德國脫離華塞條約之束縛。」⁶² 孫中山表態開啟中、德合作先河。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人繼承孫中山關於中、德合作思想，大力開展中、德合作，有力推動中國經濟和國防力量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蔣介石延續孫中山設想，試圖再一次利用戰敗後德國技術人才幫助中國進行建設。

1944 年 1 月 15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本星期反省錄」中寫下「招收德國第一

⁵⁹ 品野實，〈中日拉孟決戰揭秘——異國的鬼〉，202，轉引自餘戈，〈1944：松山戰役筆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383。

⁶⁰ 參見蔣緯國口述，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210-224。

⁶¹ 孫中山，〈在摩軒號艦對幕僚的談話〉，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517。

⁶² 孫中山，〈致鄧家彥函〉，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137。

流工程師之計劃」。⁶³ 17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列 4 名負責招收德國工程師計劃負責人：伯羽、大維、安國、永清。此四人應為譚伯羽、俞大維、戴安國、桂永清，都有與德國交涉經驗。考慮到當時中、德正處於戰爭狀態，蔣介石這一計劃應是針對戰敗後德國而制定。該計劃在蔣介石日記中沒有下文，但是在德國投降後，有人提出與蔣介石構想類似計劃。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葉道淵在德國投降後曾提交提案，建議徵召德國技術人員幫助中國進行戰後建設。葉道淵認為「德國有名之科學家、工程師、名教授及各種技術人才甚多，現正在苦難中」，應「派人調查，暗中聯絡，密與接濟，約完和平會議後敦請來華。」葉道淵還斷言德國技術人才在苦難中得到中國高薪聘請，一定會樂於效力。⁶⁴ 這份提案曾交由中央設計局進行討論，最終討論結果是「關於德國技術人員之徵召，如純採暗中聯繫之方式，在目前四國嚴密控制德國之情形下，事實上恐不易推進。似應與四國政府當局，尤其英美當局，事先商洽。目前英美之技術人才均能自給，行且過剩，當可獲其同意」。從這份檔案可以看出，當時不止蔣介石有利用德國人才構想，但這樣構想在四國分區佔領德國環境下難以實施，至於中國政府是否與四國政府進行過商議及結果如何，目前還不得而知。

四、對納粹政權採取敵對態度

儘管蔣介石對於德國軍事力量、作風和技術非常欣賞，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納粹德國政權抱同情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蔣介石曾有限介入盟國對德戰爭，為推翻納粹政權做出過努力。中、德兩國相隔甚遠，因而沒有產生直接交戰行動。但蔣介石還是盡可能援助德國內部和同盟國反納粹鬥爭。

蔣介石曾參與支持德國內部反納粹勢力行動，主要是通過軍事委員會秘書齊燮向克蘭、沙赫特、托馬斯等人提供資助。學界對此已有關注。⁶⁵ 然而，這種支持並非出於純粹反法西斯立場，而是基於現實政治考量。一方面，通過支持德國內部反

⁶³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 年 1 月 15 日。

⁶⁴ 《參政員葉道淵準備徵召德國技術人員以裨戰後建設之用的建議與意見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設計局檔案，檔號 171（2）-43。

⁶⁵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152-167；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16-420。

納粹勢力，可以增加中國在同盟國陣營中分量；另一方面，若德國發生內部政變，可能加速戰爭進程，有利於中國戰場局勢。但由於蔣介石對德國內部形勢缺乏深入了解，對這些反納粹力量影響力估計過高，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取得實質成效。

1941年11月7日，唐縱從齊燮元處獲知德國軍事情況。⁶⁶ 11月26日，齊燮元匯報德國以沙赫特、克蘭、托馬斯為代表反納粹力量醞釀政變情況，請求蔣介石將反納粹力量要求轉達羅斯福與邱吉爾，以便發動政變。唐縱曾在德國留學，對德國有一定感情，因此將納粹政權與德國民眾區分開來，在日記中贊同這一計劃。⁶⁷ 12月7日，唐縱寫成一份意見書，主張「促成德國內變，以解決世界全戰局，而重奠國際和平之基石」。唐縱還在日記中記道：根據齊燮元自德國歸來所傳德國內部沙赫特、托馬斯等陰謀政變之內情，主張派人與羅斯福接洽，得英美同意後，通知德國內部反希特勒勢力，促其發動德軍向後撤退，英蘇不加追擊，然後以各國之力解決日本武力，再召集國際和平會議，並擬定國際和平會議四項原則。⁶⁸ 唐縱將這一意見書抄呈蔣介石。唐縱在這份題為《促成德國政變以解決世界全戰局而重奠國際和平基石之意見》意見書中稱促成德國政變將使同盟國迅速將注意力轉向日本，有利於中國抗戰；一旦政變由中國促成，中國國際地位將得到提升。在文中，唐縱還提出戰後保障和平相關意見，並建議在與英美接洽後再行動。⁶⁹ 目前筆者暫未查到蔣介石對唐縱意見回應，但蔣介石在1942年1月14日日記中寫下「運動德國軍隊倒戈計劃應告知羅斯福總統」一句，可見蔣介石此時已經開始考慮實施計劃。

蔣介石對於同盟國反納粹鬥爭提供過有限幫助。如蔣介石曾在1942年3月31日，致電身在美國的宋子文，讓宋提醒美國注意德國計劃通過西班牙電台對南美洲進行反美宣傳。⁷⁰ 1943年4月18日，蔣介石又致電出訪美國的宋美齡，通過宋美齡提醒在納粹對內宣傳中，英美對德國政策與《大西洋憲章》精神不符，把德國作

⁶⁶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1年11月7日（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238。

⁶⁷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1年11月26日，239-240。

⁶⁸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1年11月26日，239-240。

⁶⁹ 《重要聲明（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02-009。
《對美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04-096。

為殖民地對待，可能會給納粹政府以口實。⁷¹ 不僅蔣介石曾向盟國反納粹鬥爭提出警告和意見，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盡可能支援盟國戰爭。曾有 21 名赴英留學之中國海軍軍官參加諾曼底登陸戰役，並立下戰功。⁷²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及其領導下中國對反對納粹德國戰爭介入是有限，作用也是有限。蔣介石雖然對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進行援助，但當時德國國內有多股反抗力量，蔣介石援助這股反抗力量並未掀起太大波瀾。在戰爭期間，蔣介石為德國抵抗力量與美英領導人「接洽」，也難獲成效。蔣介石在 1943 年與邱吉爾一次談話中，曾提及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蔣介石問邱吉爾：「閣下以為德國內部有發生變化之可能乎？」邱吉爾回答：「德之秘密員警向稱強固，而納粹黨組織亦甚嚴密，故全國人民均受控制，納粹政府一日存在，其軍隊勢將一日作戰……」⁷³ 這種回答反映出邱吉爾對德國抵抗運動態度，即不抱期望。事實也證明，雖然德軍內部有識之士認識到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本質，但多數德國軍人自始至終都為納粹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寄希望於通過德國內部政變來擊敗納粹並不明智，但這也是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為反納粹運動作力所能及貢獻。至於蔣介石及中國政府對同盟國援助，也是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蔣介石支持德國反納粹力量行動，更多體現出其政治投機傾向，而非出於堅定反法西斯立場。這也是國民政府在強權政治夾縫中求生存寫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最大貢獻在於堅持抗日，牽制、消耗大批日軍，減輕同盟國陣營在其他戰場壓力。正如羅斯福所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歐洲，打下印度……」⁷⁴ 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在二戰時期所做貢獻客觀評價。

五、對德態度之二分特徵：區分納粹政權與德國民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蔣介石對德國態度呈現出明顯二分特徵，即將德國民眾

⁷¹ 《對美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04-198。

⁷² 劉作奎，〈參加諾曼底登陸的中國軍人〉，《北京檔案》，第 10 期（北京：2004），38。

⁷³ 蔣介石，〈四國宣言具有重大意義〉，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八卷，167。

⁷⁴ 小羅斯福著、李嘉譯，〈羅斯福見聞錄〉，轉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149。

與納粹政權區分對待。蔣介石對德國素有好感，但堅決反對德國納粹政權。這種態度與他對待日本立場類似，後來被日本學者家近亮子歸納為「戰爭責任二分論」早期表現之一。⁷⁵ 蔣介石不僅對日本堅持這一認識，對另一敵對國也是如此。

客觀地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納粹德國與中華民國關係良好，且德國對中國國防、經濟貢獻良多，在抗日戰爭前期，德國成為中國重要武器裝備來源之一。在 1941 年中、德斷交時，蔣介石表達過與德國復交期望。他在對部下講話中高度評價德國，「他們民族之強盛復興，發奮有為，我們一向深表贊佩，認為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很好的友邦，配得上做我們一個朋友。」認為德國「終久要覺悟到為日寇所貽累，雖然最近他們還是盟邦，而最後必將變為敵國。」蔣介石還指出德國偏袒日本「是他們國社黨少數人之所為，而並非德國國民真正的公意」，將納粹與德國國民區分開來。⁷⁶

在 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國對德宣戰後，蔣介石這種將納粹政權與德國相區分的態度表現得更加明顯。蔣並沒有因戰爭對德國產生憎恨，對於德國被希特勒裹挾發動侵略戰爭，蔣介石感到惋惜。他在日記中寫道：「希脫勒此種卑劣與愚拙之言行，使其大好英勇之國民與其優秀之民族，全為其一二人自私之心所犧牲，殊為可惜。」⁷⁷ 在得知德國軍隊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毀滅性打擊後，蔣介石也感歎：「德國如此精強之軍隊，竟為希脫勒無知之狂徒所誤，殊為日爾曼民族惜也。」⁷⁸ 可見蔣介石雖然欣賞德國與德軍，卻對希特勒窮兵黷武、錯誤指揮嗤之以鼻。直到 1959 年，蔣介石還以希特勒「強不知以為知」，作為政治首領盲目指揮軍事導致失敗事例作為反面教材進行批判。⁷⁹

在德國投降後，蔣介石在日記評價希特勒是德國千古罪人，政略、戰略「皆謬荒絕倫，不僅害其德國，而且害及歐洲，乃至延禍東亞」，並寫下「所可惜者，日爾曼優秀之民族，不知何日方得復興耳」，正是他將希特勒和德國區別對待之最好

⁷⁵ 參見家近亮子，〈「戰爭責任二分論」在中國的源流—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抗日戰爭的敘說方式〉，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介石：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170-193。

⁷⁶ 蔣介石，〈黨政軍各機關目前急須興革的三種要務〉，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八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257-258。

⁷⁷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 年 11 月 7 日。

⁷⁸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 年 1 月 23 日。

⁷⁹ 蔣介石，〈國防研究要旨〉，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七卷，289。

寫照。⁸⁰ 有一種觀點認為蔣介石是「希特勒遠東崇拜者」，但檢視蔣介石的日記和相關言論，可以看到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蔣介石對於希特勒評價甚低。這不能僅以中、德此時已為敵對關係來解釋，因為蔣介石對德國評價並未因戰爭爆發而降低。更深層原因是蔣介石此時對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本質有更清晰認知。

在他對德僑態度上，體現這種對納粹德國政權和德國民眾之不同態度。1945 年 10 月 16 日，此時德國早已投降，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德僑寬待」一句。早在中、德開戰後，中國就對德僑實行寬容政策，保護德國僑民合法權益。⁸¹ 其中原因，如唐縱所說，「德國系交戰國，其僑民等於敵僑，但以爾後中、德邦交問題，遲早終必恢復，無論德國戰勝戰敗，中、德終有復交之一日」。⁸² 這種對僑民寬待，既是中國遵守國際公約表現，也是一種深謀遠慮政治姿態。

除前文所述在戰時反對美英違反《大西洋憲章》將德國作為殖民地對待以外，蔣介石對投降後德國也力主寬容處理。在 1943 年開羅會議上，同盟國已經商定有關歐洲問題應隨時通知中國，關於德國投降問題也邀請中國參加決議。⁸³ 在 1945 年德國投降時，中國國內局勢錯綜複雜，蔣介石一時難以顧及德國問題，他在日記中寫道：「昨閱對俄訂約各稿件，其中有對日、德二國之文句，應將德國字句刪除，明示子文我國今後國際政策，不預問亞洲以外之事，更不應與俄國有共同對德之義務也。」⁸⁴ 但當盟國召開討論處理德國問題倫敦五國外長會議時，蔣介石又為德國正當權益而發聲。他在日記中寫道：「其他歐洲問題，我皆不作表示，惟反對分離德國民族與萊因河問題發表意見而已。」⁸⁵ 當時參加外長會議之中國代表王世傑表現印證蔣介石想法。在外長會議討論法國管制德國案時，王世傑反對法國所提讓萊茵河區域及威斯特伐利亞區域脫離德國，並提醒對於德國土地也不應忽視民族主義問題，引起法國外長不快。⁸⁶ 聯繫戰時德國撤回軍事顧問、承認偽滿洲國和汪偽政權

⁸⁰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5 年 5 月 7 日。

⁸¹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13。

⁸²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四月本月大事預定表，266。

⁸³ 《開羅會議（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22-003。

⁸⁴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5 年 8 月 4 日。

⁸⁵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5 年 9 月 30 日。

⁸⁶ 王世傑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5 年 9 月 28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736。

等損害中國利益做法，蔣介石和中國政府態度可謂「以德報怨」。

蔣介石對德國態度呈現出將德國民眾與納粹政權區分對待之特徵。這種態度形成有其現實基礎：一方面，中、德兩國在地理上相距遙遠，缺乏直接軍事衝突；另一方面，蔣介石考慮到戰後中、德關係恢復問題，試圖避免激化兩國民族矛盾。這種政策取向反映國民政府在對德關係之務實考量，但其實際影響十分有限。戰後德國命運最終由各佔領國所主導，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由於自身實力和國際地位限制，難以對德國戰後安排產生實質性影響。

六、結語

蔣介石對德政策在 1941-1945 年間展現出外交考量、現實需求與強權政治下多重考慮，並非僅僅是為換取盟國援助。美國學者柯偉林認為 1941 年中國對德宣戰「與其說是一種反德舉動，不如說是希望借此來博取盟國援助」。⁸⁷ 這一論斷過於簡化中國對德政策之複雜性。

從蔣介石個人決策能力來看，其對德政策暴露出嚴重侷限性。首先，在戰略判斷上，雖然蔣介石高度關注德國軍事動向，試圖將其與中國抗日戰爭相聯繫，但其判斷往往過於主觀，特別是在預測日本是否會進攻蘇聯時，顯現出願望重於分析傾向，進而暴露出其戰略研判能力嚴重不足。這種判斷偏差，反映出國民政府在情報搜集與戰略研判方面制度性缺陷。

其次，蔣介石對德國態度充滿矛盾與片面性。他對德國軍事技術與作戰能力保持高度關注，試圖借鑒其經驗，但這種借鑒往往停留在技術層面，對納粹軍事體系與極權政治之間關係缺乏深入理解，這直接影響他後來在臺灣推動軍事改革成效。同時，作為同盟國陣營一員，他不得不採取反德立場。這種矛盾不僅反映中國在追求現代化與應對國際政治現實之間兩難處境，也顯示出蔣介石在處理複雜國際關係時能力不足。

從政策效果來看，蔣介石區分德國民眾與納粹政權政策取向，雖有一定現實考量，但實際效果極為有限。此一政策受制於中國當時國際地位，無法對德國戰後命運產生實質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蔣介石對國際格局之理解侷限——過度強調

⁸⁷ 柯偉林著；陳謙平等譯，《德國與中華民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298。

個人外交與道義立場，而忽視實力政治之決定性作用。

從更宏觀歷史視角來看，蔣介石對德政策之得失充分暴露：一方面，他對德國軍事現代化選擇性借鑒，反映出其對現代化理解的膚淺；另一方面，在處理與同盟國關係時搖擺不定，也顯示其外交思維中投機性。這些問題不僅影響抗戰時期中國國際地位，也為日後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埋下伏筆。

這一研究啟示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政策選擇，既要考量其所處歷史局限，也要客觀分析其決策能力得失。蔣介石對德政策之複雜性與局限性，深刻反映近代中國在追求獨立自主地位過程中困境，同時也凸顯出領導人戰略判斷能力與政策執行能力對國家命運的關鍵影響，對理解中國近代外交史具有重要啟示。

徵引書目

一、中文專書與期刊論文

- [1] 張北根，《國民黨與德國的關係：1912-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2]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3]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 [4]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78。
- [5] 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11。
- [6] 柯偉林著；陳謙平等譯，《德國與中華民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7]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臺北：「國史館」，2010。
- [8]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2）》，臺北：「國史館」，2010。
- [9] 王世傑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11]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 [1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1887—1926》，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13] 蔣緯國口述，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
- [14] 孫中山，〈在摩軒號艙對幕僚的談話〉，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 [15] 孫中山，〈致鄧家彥函〉，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 [16] 張憲文，〈三十年代中、德關係初探〉，《歷史檔案》，第2期（北京：1990）。

- [17] 吳首天，〈論希特勒的對華政策（1931-1941）〉，《民國檔案》，第2期（南京：1990）。
- [18] 吳景平，〈抗戰初期的中、德關係〉，《民國春秋》，第2期（南京：1995）。
- [19] 易豪精，〈從「蜜月」到斷交—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中、德外交關係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北京：1995）。
- [20] 張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關係〉，《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1995）。
- [21] 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第4期（開封：1996）。
- [22] 陳方孟，〈論抗日戰爭初期德國的對華政策〉，《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北京：1996）。
- [23] 何蘭，〈試論1938-1941年的中、德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武漢：1997）。
- [24] 王建朗，〈抗戰時期中外關係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北京：1999）。
- [25] 徐暉，〈抗戰爆發前後中、德關係的演變〉，《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徐州：2000）。
- [26] 張北根，〈抗日戰爭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北京：2006）。
- [27] 左雙文，〈轉向聯德，還是繼續親英美？—滇緬路事件後國民黨內曾謀劃調整外交路線〉，《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8）。
- [28] 李樂曾，〈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對德政策—以朱家驊使德計畫為中心〉，《德國研究》，第4期（上海：2009）。
- [29] 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第5期（北京：2008）。
- [30] 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反應〉，《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2011）。
- [31] 鹿錫俊，〈蔣介石對日德意三國同盟的反應〉，《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2013）。
- [32] 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戰爭的預測及因應—蔣介石抗日外交個案研究之四〉，《抗日戰爭研究》，第1期（北京：2014）。
- [33] 劉作奎，〈參加諾曼底登陸的中國軍人〉，《北京檔案》，第10期（北京：2004）。

二、中文學位論文

- [1] 秦世強，《抗戰時期蔣介石謀求蘇聯對日作戰的心路歷程——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 [2] 李琳，《租借法案在華實施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三、中文檔案與文獻

- [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2] 《對美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04-036。
- [3] 《留德陸軍大學學員楊彬關於德國軍隊設施概況的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軍政部檔案，檔號773-938。
- [4] 《軍令部有關歐戰研究會經費報銷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檔號787-2578。
- [5] 《參政員葉道淵準備徵召德國技術人員以裨戰後建設之用的建議與意見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設計局檔案，檔號171（2）-43。
- [6] 《重要聲明（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02-009。
- [7] 《開羅會議（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22-003。

第一作者簡介

常子磊，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

通訊地址：江蘇南京栖霞區南京大學仙林校區馬克思主義學院

通訊電郵：changzilei@126.com

第二作者簡介

楊漢馳，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史、國民黨史

通訊地址：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寧海路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

通訊電郵：2269744148@qq.com